

上

LING NAN ZHANG GU
邓端木 欧安年 江励夫 麦国良 著

岭南掌故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岭南掌故 / 邓端本等著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1997. 2
ISBN 7-80521-751-3

I. 岭… II. 邓… III. 地方史—中国—广东—典故
IV. K29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24149 号

岭南掌故 (上、下)

邓端本 欧安年 著
江励夫 麦国良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: 510600)

中山市迪丽彩色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22.875印张 450千字

199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6500套

定价: 34.50元 (上、下册)

目录

历史.....	1
人物.....	61
风物.....	126

历史

越人

在古代，人们把五岭以南的地方，称为“岭南”；又由于它是少数民族越人聚居的地方，所以又叫“南越”；而因为这块土地比中原开发要迟，故又称之为“南蛮”。据文献说，岭南“火耕水耨，土地卑湿，无有蓄积之资”。

居住在这个地区的越人，其实就是今天的壮族同胞的祖先。他们在春秋时期，已经形成部落了。但由于经常的迁徙，致使有些外国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从马来半岛迁来的。据考证，两广与福建、浙江、江苏等地，同属印纹陶文化，这一带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不少仿中原青铜兵器制造的石戈、石矛、石剑。因此，越人应是岭南土著居民。

越人有过自己独特的文化。在广西花山的悬崖绝壁上，曾经发现了规模很大的人物壁画。画面高 44 公尺，宽 135 公尺，人物线条粗犷，形象朴素；每一线条粗约四、五厘米，每一个人像约有半个人到一个人那么高，手舞足蹈，栩栩如生。有人粗略估计了一下，在断断续续的七个岩壁上，约有人像三万多个。这种规模巨大的岩壁画，不仅在中国，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。虽然这些岩壁画目前还无法断定它的创作年代，但出自壮族人民之手，则是毫无疑问的。

越人也有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，据《越绝书》记载，越人善于造舟，“水行而山处，以船为车，以楫为马，往若飘风，去则难从”。《南越志》云：“越王造大舟溺死三千”。有一定规模的造船作坊，很早便建立了起来。1976 年在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初期墓中，发掘出一面铜鼓，鼓身绘有双身船纹图形，形式与现在太平洋上诸群岛民族使用的双身独木舟极为相似；再参考这些岛屿流传的神话，学者们初步证明，在我国原始社会晚期，以至商周、秦汉、南北朝等各个时期，东南沿海都有一部分越族先民先后移殖到太平洋诸群岛，并帮助那里的人们发现了许多新的岛屿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，汉武帝时期，我国便有印度洋航线的开辟，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，派出译使偕同应募者，由徐闻、合浦等地登船，携带黄金、丝织品出国，换回明珠、壁琉璃、宝石等物品。在这些应募者中，肯定有相当数量的越人。可以说，古代的越人是卓越的航海家。

越人更有惊人的军事智慧。当秦始皇派遣五十万大军统一岭南时，曾经遭到越人激烈的反抗。越人采用游击战术，坚壁清野，不给秦军一颗粮食；然后退入深山老林，开展持久战，迫使秦始皇不得不在湖南和广西交界的兴安县境内，开凿运河灵渠，以解决粮草运输问题。虽然，在双方交战的过程中，秦军杀了越人的部落酋长——“西呕（瓯）君译吁宋”，但他们却采用诱敌深入的方法，利月山谷的有利地形，在丛林的掩护下，一夜之间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，杀死统帅尉屠睢。《淮南子》对这场战役的描写是，“伏尸流血数十万”。这一战，

给了秦军很大的教训，使他们认识到，单纯依靠武力是不能完成统一大业的。所以后来当任嚣和赵佗统率大军，第二次进军岭南时，改换战术，采取了“和辑汉越”的方针，方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。此后赵佗十分注意民族团结，自称“蛮夷大长”。

越人亦产生过自己杰出的人物，冼夫人便是其中之一。冼夫人生于南北朝时期，是广东高凉郡（今阳江一带）人；她的家族“世为南越首领，部落十余万家”（《北史·谯国夫人冼氏传》）。当时的罗州（今广东化州县一带）刺史冯融是朝廷派遣的官吏，因是“他乡羁旅”，故“号令不行”，地方豪强的势力超过了官府权势。冯融巧妙地运用联婚的方法，笼络越人中的上层份子，把冼氏女娶过来给儿子冯宝为妻，打破了“号令不行”的僵局。从此，“俚人始相率受约束”。冯宝任高凉太守，冼夫人便协助他处理政务，“政令有序，人莫敢违”，出现了民族大团结的局面。人民安居乐业，“蕉荔之墟，弦诵日闻”。此间虽经梁、陈、隋等朝代的更替，但岭南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战乱，很快便纳入中央政府的政权管辖范围。冼夫人所作的贡献是重大的。作为稳定珠江流域政治局面的重要支柱，隋文帝在统一岭南之后，便封她为谯国夫人，并追封她的亡夫冯宝为谯国公，广州总管。晚年时，冼夫人揭发了番禺（广州）总管赵讷的贪污暴虐、鱼肉百姓的罪行，为岭南人民除了一害。隋文帝遂下诏委派她负责善后事宜，“夫人亲载诏书，自称使者，历十余州，宣述上意，谕诸俚僚，所至皆降。”此时，她已是90岁高龄的老妇人了。岭南数郡之民皆奉之为圣母。岭南的水上人家

在岭南，有一种水上居民，他们以船为家，以捕捞水产物为业，长年累月浪迹江河湖泊之上，人称他们为“旦家”。

学者对这种特殊居民，很早便进行了研究，如唐朝的刘恂，在他的著作《岭表录异》中，称他们为“卢亭”，认为这些人都是卢循及其部下的后代。卢循者，东晋时农民起义军领袖也，他率众在今浙江一带暴动起义，从温州转战至福建，又从福建的福州乘船至广东，占领广州为根据地。经过数年的准备，在今韶关市誓师北伐。史书记其有“战士十余万，舟车百里不绝”。当时正是东晋大将刘裕北伐南燕时期，义军乘虚而入，前锋曾抵达南京附近的淮口（秦淮河入江之口）。后因犯了战略上的错误，被东晋军打败，东晋军还袭击和占领了义军根据地——广州，而卢循也在战斗中牺牲。这支义军后来有一部分流落在岭南一带，也可能有人避居水上，成了水上居民，故刘恂误解为凡水上居民都是“卢亭”。

南宋时成书的《岭外代答》也部分同意这种观点，作者周去非认为，有一种生活在广州一带的水上居民，他们善于水战，是卢循的子孙。但他又说，水上居民还有三种：第一种叫“鱼蛋”，专以打鱼为生；第二种叫“壕蛋”，擅长在海边捕壕；第三种叫“木蛋”，以伐木为业。为此，作者很明确地把水上居民当作一种广泛的称谓，不以“卢亭”一词来代表他们的全部。

清代编纂的《南海县志》比较客观地解释了这一部分人历史形成的情况，该书曰：“旦户其来不可考。有谓秦使尉屠睢统五军，监禄杀西瓯王，越人皆入丛簿中，莫肯为秦。意即其遗民以舟楫为宅，捕鱼为业。”如此说来，这些水上居民就是原来岭南土著居民越人的一部分，他们因不肯归顺秦朝，所以匿居水上，世代相传，便成为漂泊江河的水上人家。近人在研究世界民俗史时，亦有类似的发现。据说居住于太平洋上群岛的玻里尼西亚人，流传着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，即在遥远的古代，有一个水手，得到了水神的传授，航海技术大大地提高，因而发现了许许多多的岛屿，这个水神的名字叫 Tangaroa，翻译过来，刚好与广州方言称水上人家为“旦家佬”十分相似。古代的越人善于航海，我国东南沿海的印纹陶文化，是他们特有的文化，而这种布有几何形的印纹陶片，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诸岛中，均有发现。因此，越人在太平洋上作远洋航行，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的。

水上居民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，过去的统治阶级拿他们作贱民看待，“士人不与结婚，不许陆居”。但他们中，却不乏杰出的人才。如清初领导沿海居民起来反抗清朝迁界暴政的义军领袖李荣，便是水上人家。他们集中了三桅大船数百艘，攻打沿岸据点的官兵，焚毁哨所和军营，自号恢复粤奖军，横行海上数月，给清兵予严重的打击，迫使清廷不得不下令复界，取消了这一害民的苛政。又如清嘉庆年间，威震广东沿海，被清廷称为心腹大患的海盗（实是抵抗清政府暴政的武装力量）首领张保仔，亦是水上居民。

水上居民在鸦片战争反侵略的斗争中，发挥过重要的作用。当时广东的水师实力薄弱，战术陈旧，对抵抗侵略，保卫海疆，无能为力。为此，钦差大臣林则徐乃转而依靠渔船、蛋户。他在水上居民中招募了许多水勇，利用他们熟悉水性这一特点，乘小船出击。采取分兵合围的战术，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，连续烧毁停泊在洋面上的英舰多艘，打退了敌人的进攻，保卫了海疆。正如魏源在《道光洋艘征抚记》-书所说的：“洋船至粤旬月，无隙可乘，遂乘风窜赴各省”。

在这期间，水上居民进一步发展了水上的游击战术。面对敌人船坚炮利的优势，他们充分发挥小船灵活机动的特点，对敌人采用骚扰的战术，打了就跑，使敌人疲于奔命，整日陷于心惊胆战之中，并通过连续不断的袭击，消耗敌人的精力，从而歼灭他们有生之力量。下面摘录魏源《海国图志》中的几则描写，便可知道这些水上人家组成的水勇，是如何地打击英国侵略者的：

夷船泊于南澳港，邓制军（即邓廷桢）所募水勇，佯作商舟。乘无风攻之，夷艘甫觉，我水勇已逼其后艄，焚其帆索，伤其舵师、水手，夷艘无风不能起舵，逼近不能开炮，且小舟外障湿幔，锐弹不能入，良久风起，夷船始遁。粤中水勇，以小舟八人荡桨，旋折如飞，将及夷炮所近之处，即覆舟入水戴之而行，及至夷船，仍翻舟而上，以火球喷筒，焚其帆索，

得势即跃上夷船，不得势即仍下水，覆舟而行，锐炮皆不能及。粤东之役，官军方失利于城外，而我武举梁体群，夜以火舟三队，从穿鼻洋截攻其后，乘潮至虎门，横档夷船，甫一开炮，而我火舟已逼其后梢，火药舱轰发，雨桅飞起空中，全艘俱毁。由此可见，鸦片战争期间，水上居民是非常活跃的。他们爱祖国爱人民，英勇地抗击侵略者。虽然，由于清廷的腐败，鸦片战争是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，但水上居民抵抗侵略的爱国行动，将永垂史册。

今天，居住在大城市的水上居民，已全部搬到岸上定居了，那矗立在广州滨江路一幢幢的房屋，便是他们的新居。

客家人

客家人分布很广，除广东、广西之外，福建、江西、四川、台湾等省均有。他们是汉族的一支，原居住在山西、河南一带，东晋南渡时，始迁至江南，定居在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地。唐末，因避黄巢战乱，再南徙江西、福建等省，有一小部分甚至抵达广东的北部和东北部。这一部分人便是客家人入粤的始祖。到了元朝灭宋时，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恰好是两军交战的战场，居住在这里的客家人又有一部分因避战乱而搬迁；有一部分随南宋的勤王之师，转战福州、崖门一带。形成客家人再一次的迁移。他们多定居在龙川、五华、梅县、大埔、焦岭、兴宁、河源、惠阳、紫金、海丰、始兴、南雄、曲江等县。逐渐形成了操客家方言的地区。

由于客家人所定居的地方多是贫瘠之地，山多田少，生活困难。为了生计，他们必须要向外发展。明末清初，四川战乱最为严重，造成户口凋零，田园荒芜。清军平定四川之后，为了恢复生产，乃不得不号召外省农民入川，以开垦荒地。于是客家农民便跟随着两湖农民的足印，迁移至四川。现四川的涪陵、重庆、荣昌、泸县、内江、资中、成都、新都、广汉等地，都有来自广东惠州、梅县和江西赣南的客家移民。稍后的雍正年间，惠州和粤北的客家人，亦向花县、番禺、增城、东莞、宝安、四会、新兴、开平、恩平、台山、鹤山等地扩展。而广西武宣、马平、桂平、平南、陆川、贵县、藤县等地，则渐渐有来自梅县一带的客家人。在此期间，台湾也是人烟稀少之地，再加上郑成功部属大部流亡南洋各地，因此，梅县的客家人便乘此机会，大批迁入台湾，居住在今凤山、彰化、诸罗等地，而且“户口殷盛，邑屋相望”，很有气派。

乾嘉以后，定居在台山、开平、四会一带的客家人，因人口激增，势力扩展，与原来土著居民的矛盾越来越大。咸丰六年（公元 1856 年）发生了大规模的械斗，互相仇杀，长达十年之久。同治六年（公元 1867 年）由广东巡抚蒋益沣出面调解，内战才停止了下來，并划出赤溪一地为客户聚居区，设赤溪厅进行管理。但赤溪地小土瘠，无法容纳众多的人口，于是乃由地方财政拨款二十万两，动员大批的客家人移民粤西的高州、雷州、钦州等地，每

一个成年移民助银八两，未成年的减半支付，发给文书，送往这些地方开垦。有少量的人竟渡海迁居海南岛，据说宋庆龄的祖先也是迁居到海南岛的客家移民。

范文澜在《中国近代史》上册一书中，分析太平天国起义的骨干多是客家人时说：“广西地广人稀，广东或邻省客家人多迁来垦田谋生，客家村落不及本地人村落强大，常被本地人掠夺，彼此感情极恶，往往寻仇械斗，客家斗败，男妇老弱三千余人弃田产逃走，随北山里矿工队加入金田起义，成为主干之一。”又说：“金田战前一天（十二月二十九日）清军中客家军人数千反清加入太平军。”可以说，客家人（除官僚地主外）是被压迫的最底层，所以他们在太平军中斗争最为英勇，而洪秀全和杨秀清就是客家人。按照客家学者罗香林的研究，中西学者自洪杨事变之后，逐渐地对客家这一民系研究重视起来。1868年（同治七年）西方学者梅尔尔斯首先著文报道台山等地土、客械斗的情况，后二年（1870年）又有哀德在《中日记录及访问》刊物上发表《客家人种志略》和《客家历史纲要》等文章。1873年（同治十三年）弼顿查理斯、哀德等人复在《中国评论报》上刊登《客家源流与历史》等著述。在上海出版的《教务杂志》亦经常发表有关客家的论文，其中尤以肯比尔《客家源流与迁移》-文质量最高。在这期间，亦有专门研究客家语的辞典问世，如赖查理斯的《客法辞典》和麦榛威尔的《客家辞典》等等。在中国学者中，研究客家的著作亦纷纷问世。如同治年间大埔人林达泉著《客说》，从客家的语言探讨客家的源流。又如光绪二十六年（公元1900年）梅县人钟用作《土客源流考》，发表在香港出版的报纸之上。还有著名学者、诗人黄遵宪亦有关于这一类的研究文章。总计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光绪三十年这五十多年间，中外人士研究客家问题并有文章发表者，不下三十余人。进入辛亥革命之后，研究客家问题的人就更多了，其中成果较为显著的有赖际熙、李佐夫、郭炯彤、刘友梅等人纂辑的《崇正同人系谱》，也就是客家系谱。此书共十五卷，分源流、氏族、语言、礼俗、选举、人物、艺术、丛谈等篇章，1925年在香港出版，是研究客家问题的一本专书。近人罗香林亦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完成了《客家研究导论》，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为其作序，认为是集客家研究之大成的著作。客家研究逐渐成为一专门的学科。

在客家人中，有不少的杰出者，除上面所提的洪秀全和杨秀清之外，近代史中著名的人物便有黄遵宪、冯逢甲、丁日昌、冯子材、刘永福、廖仲凯、邓铿等人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，亦有不少客家人前仆后继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，如东江纵队便是活跃在客家地区的一支革命队伍。伟大的革命家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便是梅县的客家人。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新四军军长叶挺也是惠阳县的客家人。所以西方学者肯比尔说：“客家人确是中华民族里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……对于中华民族前途的奋发和进步，客籍人的贡献将见一天大似一天，这是可以断言的。”

南越王国

秦统一岭南后不久，便爆发了农民大起义。一时天下大乱。这时，随秦始皇南征进入岭南的龙川令赵佗，在郡尉任嚣的帮助下，据岭表之地自立王国，国号“南越”，自称“南越王”。

当时的南越，虽然划入秦的版图已有好几年了，但基本上还是以部落为单位行事。这些部落经常互相攻击、抢掠。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都有“越人好相攻击”的记载。赵佗在这纷争混乱的地区，成立南越王国，实施对岭南的行政统治，有效地制止了部落之间的互相残杀，从而稳定了南越的政局。赵佗实行“和辑汉越”的政策，使移居岭南的各族人民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，安居乐业，发挥所长，致力于南疆的开发。因此在秦末汉初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南越王国的建立，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。

汉高祖统一中国后，对南越采取和平政策，派陆贾出使，说服赵佗归汉，条件是承认南越为诸侯国，并保留南越王的称号。赵佗归属汉朝后，与中原通关市，输入先进的农具和农业技术，以改变当时岭南的落后面貌。在他的苦心经营下，到了西汉初年，广州已被列为全国十九个大城市之一，并成为珠玑、犀角、象牙、玳瑁、果布的集散地。后来吕后临朝，禁止铁器和牲畜输入南越，赵佗三次上书，请求取消禁令，都未有结果。一怒之下，便宣布脱离汉朝独立，自称南越武帝，以对抗吕后的“别异蛮夷”政策。汉文帝继位后，恢复了刘邦“和辑汉越”的方针，再次派陆贾出使，又一次说服了赵佗归汉。赵佗在答汉文帝书中表示：“愿奉明诏，长为藩臣。”陈词恳切，读之感人。

赵佗死于汉武帝建元四年（公元前137年），享年百岁。其孙赵胡继立（注），为南越第二代王。赵胡即位后，对汉廷十分尊重，建元六年（公元前135年），闽粤王郢兴兵侵犯南越边境，赵胡坚守汉廷关于各藩国不得自相攻击的告诫、一面严守疆土，一面派人报告朝廷，请中央政府出面调停，得到当时在位的汉武帝赞扬，并出兵制止了闽越的军事行动。赵胡为了表示对汉朝廷的信任，派太子婴齐到长安为人质，加强对汉朝廷的依附，进一步密切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。赵胡在位十多年，于元狩初年病逝。其子婴齐立，是为第三代南越王。婴齐碌碌无为，在位不过七、八年便死去了。

第四代南越王名兴，母樛氏，是汉人，因与当时执掌大权的丞相越人吕嘉政见不合，母子两人同时被杀。本来婴齐在与樛氏结婚前，已娶越族女子为妻，生一子名建德，封为术阳侯。吕嘉杀兴和樛氏后，便立建德为王，是为第五代南越王。这第五代南越王的建立，亦是越人贵族势力膨胀的结果。因婴齐碌碌无为，南越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越人贵族集团的手里。为此，他们煽动反汉族情绪，进一步加强了越人贵族的势力。

但是，当吕嘉杀南越王和王太后的消息传到朝廷后，汉武帝便抓住这个时机，出动十万

大军，兵分五路征讨南越。杀吕嘉和建德，灭南越国。至此，南越的赵氏政权经历了五代九十三年时间，终于为汉武帝所灭。汉武帝分其地为儋耳、珠崖、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九郡。

南越王国虽然消失了，但它对岭南的开发是有建树的。特别是赵佗，他的功绩是很大的。

注：最近在广州象岗山第二代南越王墓，发现一枚“赵昧”印章，据此，赵胡实则赵昧之误。

五羊仙人

广州又名羊城，简称穗。这些名称的来源，均出于五仙骑羊持穗降临楚庭的神话。现在坡山的五仙观，仍然供奉着五仙人。那么，神话中描绘的仙人骑羊和持穗是怎么回事呢？

原来古代岭南一带，居住的都是越人，即现在的壮族。越人的文化和生产技术，与中原相比，当然是落后得多。那时的楚国拥有豫南、湘、皖、赣、鄂等地，其文化和生产技术，对越人影响最大。岭南种植五谷的技术，就是由楚国传入的。楚国的国王姓芊，芊乃是羊的古字。因此，便出现了五仙骑羊持穗降临的神话。说的是羊姓的楚国人，把谷种由北方送到了广州，从此，越人在农业上便得到了发展，过上了好生活。最后，这五仙人祝福阡陌之内，永无饥荒。言讫，便化为五彩祥云，腾空而去。

但也有人认为，五仙骑羊持穗的神话，与中原向广东移民有关。在西周后期，楚国境内的汉阳，居住着一群姬姓民族，也就是周朝王室的后裔。因周室衰微，所以受到诸侯之一的楚国排挤。他们不堪压迫，便带着自己的羊群和谷种，迁移至岭南地带，把种植农作物的技术，传播于广东，开创了百越人民文明的先河。这就好比仙人降福于大地，所以神话把他们美化而为神仙。

不管怎么说，这两个神话，都反映了岭南开发的面貌。

五仙骑羊持穗降于楚庭的传说，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所以，代代相传，历久不衰。还有不少人作诗赞颂。清人陈坤便有诗咏曰：

六出祥征秉穗来，楚庭曾见五云开。

重熙累洽唐虞盛，戡谷诗虞遍八垓。前广州市长朱光亦填词一首云：

广州好

城古越千年，

饱阅沧桑消劫烬，

缅怀缔造接前贤，

山立五羊仙。广州之得名

广州，古称番禺，“广州”这一个名称是在公元三世纪时才有的。

公元二世纪末期，天下大乱，。当时的岭南属孙权势力范围。公元 210 年（东汉建安十五年），孙权任命步骖为交州刺史（当时的交州辖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日南、九真七郡，治所在广信，即今（广西梧州）。步骖赴任时，沿途剪除异己势力，杀吴巨、区景}等人。到任后，很快又把治所迁至番禺。在迁治途中，与吴巨的旧部衡毅、钱博，大战于高要峡（今肇庆峡），遂清除了这些豪强势力，进入番禺。《水经注·很水》篇记载步骖抵番禺时，曾登高远望，见巨海苍茫，原野开阔，丘陵地带种满了桑树，肥沃的土地，庄稼成行，鱼游水底，鹰击长空，“珍怪异物，千种万类，不可胜记”。禁不住赞叹道：“斯诚海岛膏腴之地，宜为都邑”。之后便建设了步骖城。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，番禺成了吴国的造船基地和对外贸易基地。

吴黄武五年（公元 226 年），孙权认为交州辖地过于辽阔，不易管理，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，吕岱为刺史；交趾以南为交州，戴良为刺史”，（《-国志》卷 49《士燮传>）。广州因此得名。其所以叫广州，是因为从广信迁治而来，取一广字也。

交、广分治之后，交趾太守士徽拒不执行这一命令，陈兵海口，不让刺史戴良入境。于是孙权令广州刺史吕岱发兵征讨士徽。吕岱督兵三千，从海道日夜兼程进发，很快便攻下了交趾，平定了叛乱。为了让吕岱能集中权力处理平叛后的善后事宜，孙权又恢复了原来交州的建置，不再交、广分治了。到了永安七年（264 年），孙权的儿子孙休才实行了交广分治。从此，广州的行政建置就变动不大了。广州这个名称，除隋文帝时因避杨广太子讳，曾一度改名为番州外，便一直沿用至今了。

古代外国人笔下的广州

广州，在古代就是一个闻名世界的国际港口了。

最早用文字向世界介绍广州的外国人，是阿拉伯商人苏莱曼。此人曾经商于广州，回国后于公元 851 年（唐宣宗大中五年）著成《东游记》。书中称广州为“康府”（即“广府”，唐在广州设中都督府，外国人简称曰“广府”），是中国的一大都会。由于该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广州对外贸易、城市建设、民间风俗等情况，因而在阿拉伯人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到了后来，又有阿布赛德哈散写了续集。续集主要记述依宾瓦哈伯在黄巢起义前后游历中国的情况，对广州亦作了大篇幅的记载。

公元 864 年（唐懿宗咸通五年），曾经有一个叫依宾库达特拔的阿拉伯人，写了一本《省道记》，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四大贸易港，其中广州港是四大港中最重要的一个对外贸易基地，又是水果、甘蔗、蔬菜的著名产地。

元代时的介绍更多且比较详细。元代版图辽阔，交通发达，故有许多旅游家来中国旅游。中世纪时西方四大游历家之一、意大利人鄂多立克，以其亲身经历写了一本《东游录》，称

广州为辛迦兰大城。这个城“比威尼斯大三倍”，有“数量极其庞大的船队，……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只多”。他还介绍了广州人喜欢吃蛇的情况。鄂多立克的《东游录》至今仍是世界名著之一，翻译成好几国文字。与鄂多立克齐名的另一游历家、摩洛哥人依宾拔都他，亦在1325年（元泰定帝二年）动身来中国。他在游历了广州之后，盛赞广州的繁盛，认为广州是当时世界大城之一，“市场优美，为世界大城所不能及”。其间最大者，莫过于陶器场。由此，商人转运瓷器至中国各省及印度、夜门。”依宾拔都他的《游记》至今仍流行不衰，已译成英、法、德等国文字。我国中西交通史研究专家张星娘亦曾将其部分章节译成中文，介绍给中国读者。

广州的芦荻巷

现在广州中山七路附近，有一条叫芦荻巷的街道，很久以前，这里曾是芦苇丛生的江岸。

广州地貌变迁很大。1937年，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吴尚时教授，曾在广州市郊七星岗发现海蚀崖和海蚀平台，证明至少距今六千年前，广州大部分地方为海水所淹没，当时狮子洋的海浪可以直拍越秀山麓。珠江三角洲实际上是东、西、北三江在海湾上淤浅而成的。从地质钻孔的情况来看，现在的省政府、科学馆、光塔路、天成路、大德路、大南路、宝源路、南方大厦等地的地层下面，都有蚝壳，大南路和大德路还发现有泥蚶。宝源路地层的海贝年代，鉴定为二千一百年前，说明这一带汉代还是海域。所以《水经注·很水》篇中，记汉末建安年间，步鹭为交州刺史来到广州时，广州的地形是“负山带海”，而且“海怪鱼鳖，鼃鼃鲜鲔，珍怪物，千种万类，不可胜记”。直到唐代和宋代，黄埔附近的水域仍被称为大海，海珠桥附近被称为小海。

唐代光塔街一带为码头区，怀圣寺后面高高矗立的光塔，是引航的标志。当时外国侨民不许进城居住，故来广州经商的阿拉伯人，只好在这一带定居。

宋初，中山六路西门口以西的地方，仍未成陆，波浪滔滔。古代广州三石之一的浮丘石（位于中山七路东侧），还是一片微微露出水面的礁石。据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的记载，宋初，有一位百岁老人陈崇义，言其儿时所见的浮丘石，泊有舟船千艘，“石上篙痕宛然”。

浮丘石的地理位置正好在芦荻巷的附近，因此，这一带成陆之前，完全有可能是芦苇丛生的江岸，那么芦荻巷当是名符其实的了。

广州拾翠洲

春尽之官直到秋，

岭云深处凭泷楼。

居人爱近沉珠浦，

候吏多来拾翠洲。

这是唐朝诗人陆龟蒙《送李明府之任南海》诗，也是最早介绍拾翠洲古迹的史料。“候吏”是迎送官吏之意，可见当时的拾翠洲是一个水陆码头，为官吏迎送之所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地理的变迁，到了明嘉靖年间，戴碌修《广东通志》时，这个拾翠洲已经荒芜不可考了。该书曰：

拾翠洲在府城西南三十里，古有津亭，今华节亭与古津亭相近，但洲迹已荒，不可考。陆龟蒙诗云：候吏多来拾翠洲是也。

这拾翠洲是在哪里呢？《大清一统志》广州府朝亭条有这样一段记载：

朝亭在南海县西十里碓（音洞）船澳。《宋书》云：

泰始四年，刘思道攻广州，刺史羊希遣兵御于朝亭即此，后为西候津亭，明时为送迎之所。

明成化中都御

史韩雍扁日华节。据此，这个建于碓船澳，后来称为西候津亭的朝亭，也就是明时华节亭的前身。西候津亭在唐时被称为津亭，故唐代张九龄《送广州周判官》诗中，亦有“海郡雄蛮落，津亭壮越台”之句。说明这津亭是当时的名胜之一，与越王台齐名，而且相距也不会很远，否则，便显示不出“壮越台”的景色了。

“节”是皇帝派来高级官吏的信物。“华节”即接官的意思。说明《大清一统志》的记载与陆龟蒙诗相吻合，故拾翠洲的地址亦当在碓船澳。查碓船澳在今彩虹桥附近，古代从澳口可以坐船至此，且江面辽阔，因此曾经在这里发生过水战。成化年间，这里仍是广州西侧的重要水陆码头，所以成为接官的场所。此处属南海县境，距离当时的广州城也只数里（接近十里），离越王台所在地越秀山亦不很远。至于《戴通志》说它在南海县西南三十里，是否笔误，还是古人另有计算方法，这就要待进一步研究了。早期航海旅游笔记与岭南

我国虽有悠久的海外交通历史，但海外旅游笔记却迟至三国时才有出现。这些旅游笔记的作者，大都是通过岭南的港口或经过岭南的海域出国考察的。

孙权黄武五年，交州刺史吴岱派遣宣化从事朱应，中郎康泰出使扶南（今柬埔寨）等诸国。他们从岭南的港口出发，航海沿林邑（今越南南部）南下，首先访问了暹罗和扶南，然后渡暹罗湾沿马来半岛访问，到过缅甸沿岸等国。据他们说，“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”。

朱应、康泰两人在国外十多年，回来后，将其所见所闻写成《扶南异物志》、《吴时外国传》和《扶南传》等书，这就是我国最早的海外交通旅游笔记。在这三部书中，又以《吴时外国传》最有价值。该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扶南的政治、经济和风土人情，对航海事业的介绍，尤为详细。据说，当时的扶南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强盛的一个大国。国王范蔓，拥有强大的海军，用武力征服了邻近的十余国，开地五、六千里，震动了整个东南亚。后王范旃，造

大船“穷涨海（南海）”。派遣亲信官员苏物乘坐大海舶出使印度，向当时的天竺王致意。当苏物的海舶抵达印度时，天竺王惊曰：“海滨极远，犹有此人。”即令扶南使团人员参观其国，并派了一个名叫陈宋的官员回访扶南王范旃。当陈宋抵达扶南时，朱应和康泰与他相见，“具问天竺土俗云云”。该书还描绘了扶南的文明：国都有城郭官室，国家富足，土地肥沃，一年收成可供三年食用等等。可惜这些旅游笔记俱佚，只保留了一些段落在《水经注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书之中。其中保留最多的也是《吴时外国传》。

东晋高僧法显，以其亲身经历写成的《佛国记》，亦是我国早期的一部重要旅外笔记。法显姓龚，山西临汾人，自小出家，于东晋隆安三年自长安出发，从陆道抵印度取经，“历三十余国”，长达15年。他是我国见诸史籍的第一个从印度取海道，经由东南亚回国的僧人。法显的《佛国记》记述航海的篇幅虽然不多，但却十分具体。书中明确记叙东晋时从斯里兰卡到中国，已有商船可通，航程共分两段：第一段为斯里兰卡至爪哇，需时3个月；第二段为爪哇至广州，需时约50天。并提供了当时船舶的运载情形：法显乘坐的商人大舶，能载200多人和供其食用50天的粮食。在航行中遇到大风时，飘流了十二昼夜而不沉。当时与法显同坐大船的，绝大部分是商人，都是来广州经商的。

《佛国记》虽然只有9500多字，但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，至目前为止，已有英、法、日等国的译本，并被公认为是研究早期海外交通史和印度、斯里兰卡等国历史的重要著作之一。

唐代佛教的传播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，因此越来越多海外旅游笔记出自僧人之手。其中最要有价值的要推义净的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了。

义净于唐高宗咸亨三年，约集同伴数十人至广州，拟乘船往印度取经。到了将要登船出发时，这些人都因害怕困难而退出。独义净坚持到底，只身前往。先到苏门答腊岛的室利佛逝国，然后到马来半岛的吉打，再由吉打乘船至印度。途经一“裸人国”，即现在的尼科巴岛。在义净的记载中，这“裸人国”风景幽雅，椰子树，槟榔林，森然可爱。岛上居民见商船抵达，即争乘小艇前来贸易，携来椰子、芭蕉及藤器、竹器等物，换取铁器。一块大如二指的生铁，印可换椰子五至十颗。这些居民都赤身露体，不穿衣服，妇女只用树叶稍为遮蔽一下身体，“商人戏授其衣，即便摇手不用”。热带风光，跃然纸上。

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一共记录了西行求法高僧六十人，并为他们作了传。这些传略为研究佛教和中西海外交通积累了极为宝贵的资料，特别是书中记载的一些僧人的海上航行情况，更是珍贵的航海游记。

在这期间，有两位不大被人注意的航海旅游家，一个叫达奚弘通，一个叫杜环。达奚弘通曾于上元中被委任为政府的使臣，从马来半岛南部西岸航行至波斯湾头，著有《海南诸蕃

行记》-书。记述他自赤土国（马来半岛的吉打）至虔那（今阿拉伯半岛南部）之间三十六国的访问情况。广州的南海神庙里树有他的像。据说，他出使归国时，曾在庙前登陆。杜环，则是唐代历史学家杜佑的族子，于天宝年间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征西域，在怛罗斯（今苏联塔什干境内）战役中，为大食人所擒，流落国外十多年，在宝应初年随商船回国。后来写成《经行记》-卷。该书记载了当时阿拉伯国家许多风土情况。可惜《经行记》已佚。杜环回国登陆的地点，正好是广州港。因此广州作为我国古代的航海大港，与早期航海旅游笔记的诞生，实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粤人最早的著作之一

《异物志》

广东南海人杨孚撰写的《异物志》，是粤人早期的一本著作。

《异物志》著于汉章帝时（公元 76 至 88 年），至宋代散佚。鉴于此书的历史价值，清初学者屈大均在著《广东新语》中，希望有人能够把它搜辑成帙。他在按语中说：“粤人著作见于史志，以议郎为始。”（注：杨孚曾任议郎之职）。

《异物志》内容广泛，大量记载了当时岭南的动、植物种类及其生长情况，和它们在经济开发方面的利用。如关于水稻的生长，该书已有“夏冬又熟，农者一岁再种”的记载；在经济作物方面，特别提到了甘蔗栽种情况：由于岭南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故甘蔗生长特别茂盛，不但“远近皆有”（大面积种植），而且“围数寸，长丈余”，长势良好。并证实了我国在东汉时期已经制糖，“斩而食之既甘，榨取汁如饴饧，名之曰糖”。关于广东蕉布的制作过程，也有记录：“取纒（锅）煮之，为丝，可纺织”，反映了广东古代纺织业的发达。特别是海南岛的少数民族，很早便掌握了纺织技术，而且出现了专业纺织户。从描写中，人们可以看到被誉为花果之乡的岭南，荔枝、龙眼果实垂垂，雪白的桔花发出诱人的馨香，椰子与棕榈在迎风摇曳，甘蔗芭蕉的绿浪似海涛漫涌。在当时岭南的柑桔，是被指定为贡品，并设桔官专管的。

此外书中所记录的许多珍贵史料，如关于“瓮人”的记载，与今天汉墓出土的黑奴俑完全吻合，据考古学家鉴定，这种“面体异黑若漆……为奴婢，强勤力”的“瓮人”，就是当时由外国贩运而来的黑奴。

《广东新语》云：“南裔异物赞（即《异物志》），亦诗之流也。然则广东之诗，其始于孚乎！”如“榕树栖栖，长与少殊；高出林表，广荫原丘，孰知初生，葛之藁侔”，是可以作为诗歌朗诵的。

《广东新语》还引民间传说，言广州河南的得名，始自杨孚。杨家住珠江之南下渡头村。杨孚辞官归来时，曾携带了河南洛阳的松柏，手植于宅前。这些松柏也很奇怪，隆冬时节，

居然引来大雪盈树，人们因这些松柏来自河南，所以称杨孚的故乡为河南。唐朝诗人许浑的诗便有“河畔雪飞杨子宅，海边花盛越王台”之句。诗人屈大均亦有诗曰：

能将北雪为南雪，
为有苍苍自洛来。
松柏至今虽已尽，
花田尝见雪花开。灵渠的建设

灵渠是秦代继万里长城、都江堰之后，又一规模巨大的工程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条越岭运河。

灵渠的开凿，主要是出于军事运输的需要。为了保证进军南越的军粮运输，需要把湘江和漓江打通，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接起来。

当时杰出的水利工程师史禄，动员了五十万军民，在现广西兴安县城北的龙王山下，筑起一条状似犁头的石堤，把湘江上游的海洋河拦截起来。构成分水塘，然后凿北渠引水复入湘江；凿南渠经兴安县城向西流，与桂江上游大溶江水相会合，流入漓江。

北渠长三公里多，呈迂回曲折状，穿行于平畴沃野之间。南渠长三十一公里，由于经过之处多是山地，且湘江的水平面要比漓江低。因此，为使南、北渠顺利通航，史禄令人在水位差较大的地方，用巨石筑了一个又一个的“斗门”（又叫陡门），利用逐级提高水位的方法，使航船在逐斗上进和下降中，安然过山。就这样，从湘江下游驶来的船只，通过北渠，再进入南渠，经漓江、桂江，出西江，便可直达广州了。

灵渠的建成，不仅帮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，而且在后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还起到沟通南北交通的重要作用，促进了全国政治的统一，和南北文化、经济的交流。因此清人陈元龙在《重修灵渠石堤陡门记》中说：“陡河虽小，实三楚两广之咽喉，行师馈粮，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，唯此一水是赖。”明方异的《灵渠赋》亦说：“南则达于两广，北则会于三湘。”并且“舟车辐辏，阗闐喧嚣。……渔歌款乃，帆影飘飏”。想当年，“巨舫鳞次”、“舳舻云接”、“帆樯相错”，该是何等的气派！今天，它虽然完成了历史使命，然而，作为世界第一条越岭运河，它的价值仍然是无可估量的。现代的航道渠化工程，就是吸取陡河工程的经验发展而成的。

广东第一个成帝业的人

南北朝时期，陈朝的陈武帝，是广东第一个成帝业的人。

陈武帝叫陈霸先，吴兴郡长城县（今浙江长兴县）人，出身贫苦，早年当过里司、油库吏、传令吏等低级职务，后来为新喻候肖映（肖梁宗室贵族）所赏识，当削映任广州刺史时，便把他带去，在军中提任小军官之职。陈霸先作战勇敢，有谋有略，屡立战功，特别是参与

镇压交州农民起义，官位日益显耀，遂任高要郡（今广东高要县）太守。梁武帝太清三年（公元549年），侯景举兵反梁，梁武帝在台城（南京宫殿）被困饿死。侯景据建康（南京）三吴之地后，自称汉皇帝，并联络广州刺史元景仲，企图遥相呼应。陈霸先识破了他们的阴谋，起兵讨元景仲；包围广州城，元景仲不敌自杀。陈霸先乃率兵进入广州，并迎接当时梁宗室、定州（今贵县）刺史肖勃为广州刺史，陈霸先则驻防始兴（今韶关市）一带。太清三年（公元549年）底，陈霸先准备出兵讨伐侯景，肖勃知道后，派人去劝阻他说：“侯景兵多将广，所向无敌，正是气焰嚣张的时候，你区区兵马，怎么能打得过他呢？不如且住始兴，遥张声势，明哲保身为上。”陈霸先不听他的功阻，坚持出兵。肖勃又派心腹谭世远为曲江令，暗中掣肘，还联洛江西赣州的地方豪强蔡骆养，在大庾岭上布置兵力拦截，不让陈霸先出广东大门一步。公元550年（梁简文帝大宝元年）正月，陈霸先率兵进入大庾岭，与蔡骆养部队遭遇，结果大破蔡骆养兵，进军江西赣州。在这关键时刻，高州刺史李迁仕起兵反对陈霸先，派杜平房率军跟踪至江西，并与宁都地方豪强刘霨联络，企图前后夹击陈军，但又被陈霸先打败，因而长驱直入南昌，并于公元551年在九江会合王僧辩部，击败侯景，攻克建康，进而创建陈朝，完成帝业。

在此之前，以广东为根据地，北上争夺帝业的，曾经有东晋时期的卢循，但卢循失败了，而陈霸先却获得了成功。考其原因，主要是陈霸先得到了岭南豪强的支持，免除了后顾之忧，特别是洗夫人对他的帮助。洗夫人除了用计赶走陈霸先的心腹大患高州刺史李迁仕外，还亲自率兵与陈霸先相会于赣石，表示要做陈的坚强后盾。此后，在一些关键的时刻，洗夫人都起来支持陈霸先所建立的陈朝，从而巩固了陈政权的统治。永定元年（公元557年），虽有广州刺史肖勃反，但很快便镇压下去。另外，陈霸先起兵讨侯景，在当时来说，亦属正义之战。因侯景是西魏的降将，早有灭梁的企图，他除掉梁武帝之后，大事烧掠，对三吴地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，江南的繁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。因此，制裁这样的杀人魔王，自是顺应民心。侯景被清除出建康之后，北齐又派兵护送梁武帝的侄子肖渊明来作梁主，企图变梁国为其附庸。陈霸先不畏强暴，拒绝了北齐的要挟，另立肖方智为帝，粉碎了北齐的阻谋。这抗齐之师，受到人民热烈的欢迎，当陈霸先的军队缺乏粮食时，江南人民慷慨地献出自己的口粮，并以荷叶裹饭，中间夹着鸭肉来慰劳军队。两军交战时，“百姓夹淮观战，呼声震地”（《陈书》卷一）。他对北齐的抵抗，保护了汉族政权。后来他灭梁称帝，也就更进一步巩固了汉民族对南方的统治。

唐代岭南地区的豪强

唐代，在岭南地区被称为“蛮酋”、“酋豪”、“首领”的，就是当时的地方豪强。

唐代的广东仍属边远地区，中央政府鞭长莫及，除广州、韶州（今韶关市）这些重要的